

度尽劫波兄弟在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台前幕后

王廷兴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度尽劫波兄弟在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台前幕后

王廷兴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度尽劫波兄弟在/王廷兴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073-2644-4

I.度… II.王… III.国共合作-历史 IV.K2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593 号

度尽劫波兄弟在

著 者 / 王廷兴

责任编辑 / 于俊道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设计制作 / 成都圣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成都圣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四川西南建筑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1/32 7 印张 175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6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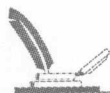
定价:21.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民族危急	(1)
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1)
二、国共两党对日本侵华的不同政策	(5)
三、华北事变	(9)
第二章 日本侵华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	(15)
一、英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政策变化	(15)
二、三十年代苏联的远东政策	(24)
第三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33)
一、人民的抗日怒潮	(33)
二、国民党爱国将领奋起抗日	(42)
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抗日反蒋斗争	(50)
四、中国民主党派和中间势力政治态度的变化	(53)
第四章 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	(59)
一、“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政策的形成	(59)
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恶果	(61)
三、误国政策的转变	(65)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	(69)
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	(69)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发展	(74)
三、瓦窑堡会议	(80)



四、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转变	(88)
第六章 国共两党非正式的秘密接触	(95)
一、蒋介石寻求与共产党对话的原因	(95)
二、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四条渠道	(100)
三、中共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与南京当局的谈判	(106)
四、潘汉年与南京当局的谈判	(116)
第七章 国内时局转变的枢纽	(126)
一、建立西北抗日联盟	(126)
二、西安事变的爆发	(133)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42)
四、中共为稳定国内和平局势继续作出贡献	(151)
第八章 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	(160)
一、潘汉年再负重任	(160)
二、西安谈判	(165)
三、杭州谈判	(170)
四、庐山谈判	(175)
五、第二次庐山谈判	(179)
六、南京谈判	(183)
七、第二次南京谈判	(187)
第九章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4)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	(194)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征	(197)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意义	(204)
结束语	(213)

第一章 中华民族危急

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日本国与中国相邻，相比之下，日本是一个小国，它却成了近代中国的严重外患。日本帝国主义从它发展资本主义起步开始，就把侵略中国作为扩张自己的基本方针，并制定了关于霸占中国的台湾，吞并朝鲜，占领“满蒙”（东北、内蒙古），灭亡全中国，直至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从1911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把主要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满蒙地区”，它曾4次与沙俄签订瓜分“满蒙”的密约，两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并大力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妄图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

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即将崩溃，就积极策划分化中国革命阵营，推动国民党右翼集团反对共产党，以求保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币原外交”。他们认为，当时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能拉拢的对象。1926年底，日本外相币原派他的心腹，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会见蒋介石。1927

年1月，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又在庐山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分子举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之后，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就在全中国建立了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政权，公开“围剿”、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由此，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随着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崛起，以武力争夺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1927年6月下旬至8月13日，由日本政友会头子任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主持，先后召开了两次“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正式确立了以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即先独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此后，日本不断在中国制造流血事件。1928年，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制造了大肆屠杀中国工农大众的“济南惨案”。就是对其所支持的中国军阀张作霖，一旦稍有不听使唤，没有答应与日本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和“解决满蒙诸悬案”的要求，便趁张作霖对蒋介石在关内作战失败，由关内退回关外之机，于1928年6月4日晨，命令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路轨上，埋设大量炸药，将张作霖所乘专列炸毁，使张作霖身亡。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也席卷了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困难，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步伐，其目标就是中国的东北三省。日本的国土只相当于中国的1/30，日本的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7。为什么一个小国敢于欺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不仅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而且中国政府正忙于内战。首先，蒋介石置民族危急于不顾，既忙于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

军队“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犹如“一盘散沙”。其次，日本帝国主义也看到，欧美列强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在国内忙得不可开交，无暇东顾。再次，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被蒋介石拖入关内内战的漩涡，使东北的防务受到削弱。当时，东北军总兵力28万，有14万余人的精锐部队留驻关内，在东北驻军只有11—12万人，主要部分驻吉林、黑龙江两省，辽宁驻军只有3万人。这样，东北兵力空虚，日本帝国主义便乘虚而入。

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从1929年7月份至1931年7月曾组织四次“参谋旅行”，秘密侦察中国东北的实际情况。1931年6月，日本陆军省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并指定由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提出作战计划。为了攻占沈阳，日本参谋本部于同年7月从国内调运了24厘米口径重型榴弹炮两门，隐蔽地安置在沈阳南满路车站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并确定和瞄准了攻击目标。8月1日，任命对东北情况非常熟悉，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上任后，立刻审查了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作战计划”。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连续组织军事演习。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部柳条湖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对沈阳城发动了武装进攻，从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也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标志着日本武装侵占中国的开始。19日晨，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军司令部北大营和沈阳城，并按预定的计划向南满铁路全线展开进攻。9月底，日军占领了

辽宁（除辽西）和吉林二省。11月底占领黑龙江。1932年1月3日，日军又占领了锦州。2月5日，哈尔滨失守。至此，仅仅4个月的光景，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3千万骨肉同胞惨遭日军的蹂躏。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又一手策划了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日本就提出了“建立以宣统皇帝为首，领土包括东北4省及蒙古”的新政权。1931年11月，日本特务机关挟持溥仪到东北。1932年2月成立“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所谓“独立”宣言。3月9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定都长春，改名新京。9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双方签署《日满议定书》，规定“满洲国”的国防、军事、交通枢纽、官吏任用，均由日方“管理”和“保荐”，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的殖民地统治。

在军事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于1932年9月成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动员伪军警配合日本侵略军经常对各处“讨伐”、“扫荡”，成千上万的村庄被焚毁，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例如，1932年9月14日，日军包围抚顺平顶山村，对全村老幼3千多人，进行了集体屠杀。烧毁了房屋八百多间，使平顶山村变成了一片焦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在东北因“反满抗日”而惨遭杀害的有6万7千多人。

在政治上，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保甲制，连坐法”，规定“一人犯法，十人连坐”。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规定学校里不准读中国历史、地理，把日语作为“国语”，鼓吹“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反动谬论，摧残民族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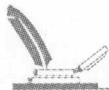
在经济上，进行残酷的掠夺。1931年以前，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14亿日元，占日本在华投资的60%。占国内进口豆类的

76%、煤的64%、铁的46%都来自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最庞大的殖民掠夺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势力扩大到东北经济的各个领域。它垄断了东北境内的全部铁路，控制了汽车和运输事业。它除经营鞍山铁所和抚顺煤炭社外，还拥有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和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等许多子公司。除“满铁”和这些垄断组织掌握下的企业外，三井、三菱、大仓、东洋拓殖公司、住友、根津、安田、浅野等财阀的势力也伸入东北，进行经济掠夺。“满铁”和这些垄断组织掌握下的企业，操纵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在东北农村，日本侵略者大量霸占农民土地，并强迫农民种植大豆、小麦、大米、棉花，直接输往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实现其殖民统治之后，便进一步向关内扩张。它又大造舆论，声称“热河为满州国土”，“长城为满州国界”。1933年1月1日夜，日本进犯山海关，3月份占领了热河全省，5月12日，又占领了通州，包围了北平、天津。

二、国共两党对日本侵华的不同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迹象十分明显，身临其境的张学良曾急派人向蒋介石请示对策。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密电给张学良，即著名的铣电，明白地下达了他的“不抵抗”政策，电文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¹⁾张学良接到这个电报后，犹豫了21天，最后，于9月6日，还是对其部属下达了“对于日人无论如何行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争端”的命令。



9月18日，中国东北军以十万火急的电报向蒋介石请示办法时，蒋介石仍严令东北军“不许冲突”，谓“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²⁾“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³⁾。蒋介石下达了这样严厉的命令后，犹恐别人不认真贯彻执行，放心不下，嗣得宋子文汇报：“张副司令（张学良）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收藏于兵械库，切无还枪报复矣”。⁽⁴⁾蒋介石才放心。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闻讯后，立即由南昌赶回南京，并立即召开其高级军政官员研究情况，商量对策。会上，虽有于右任、邵力子、张伯中等坚持：日军既已发动进攻，就应当先行抵抗，然后再议其他，蒋介石、何应钦等极力表示反对，认为，当前国力不支，军备不足，财力薄弱，工业落后，不足以言战，竭力主张采取不抵抗方针。会后，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号召全国上下要“镇静”，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还认为，“据日本官方消息认为此次冲突（指“九·一八”事变）实为不幸，已电令日军长官勿令扩大”。⁽⁵⁾因此，中国如贸然抵抗，就会使问题复杂化。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收复失地。9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为满洲事变发表宣言。宣言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立场，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目的是“增加它在满蒙、华北的统治，来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宣言强烈要求日本放弃一切在东北的殖民地特权。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决议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和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根本目的，揭露了

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也立即采取了紧急行动。东北地区早在1923年初就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到1927年秋，东北各地已经建立了北满地委、大连地委、奉天支部等40余个基层组织，并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省委成立后，省委机关迁至沈阳办公。“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就领导了东北地区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且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省委的主要任务。1931年春，满洲省委即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东北的各种阴谋活动和战争已迫在眉睫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并且对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组织军事演习、不断增兵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事变后的第二天，满洲省委印发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2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还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共满洲省委在这些文件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政治总危机空前剧烈的基础上，相互矛盾更加尖锐化露骨化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满蒙政策”，“大陆政策”，为挽救日本命运，所必然采取的步骤。文件还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振奋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精



神，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东北、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抗日的爱国主义浪潮。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企图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问题。

1931年9月20日，国民政府南京会议上通过的五项决定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严厉实行不抵抗政策，一切行为交给国联处置，不与日本单独会议，不讲和，不订约，不绝交，不宣战，由组织上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向各国呼吁要求他们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以后，为了加强外交活动，立即成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陈立夫、孔祥熙、丁惟汾、于右任、颜惠庆、李石曾、罗文干等人为委员，蒋介石本人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参与其事。这个委员会完全按照会议决定行事。接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通令中国驻外各使馆：“仰向驻在国政府切实接洽并探询其态度，迅速电部为要”。⁽⁶⁾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国联理事会发出正式申诉。蒋介石声称“此为一外交之转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三）省……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并扬言中国应“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处断”。⁽⁷⁾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中国的申诉。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宣读中国的申诉，并声称，中国方面已经实行不抵抗，不扩大事态，要求日军全部撤出中国东北。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反诬事变是由中方挑起的，日军行动纯属“自卫”，攻击中国破坏日本根据国际协定在东北所应享有之权利。国联于30日，通过一纸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同时撤军，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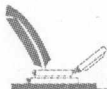
免冲突。日本根本不听这一套，仍在中国东北继续扩大侵略行动。10月8日，日军轰炸了锦州，并把冲突从辽宁、吉林两省扩大到了黑龙江。在这种情况下，10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9日以前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然而日本在同一天发布政府声明，表示它决不会单独撤军，这样国联的决议就成了一张废纸。

蒋介石依靠国联要求日军撤出东北失败后，他又提出一个新的行动方针：要求各国不承认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事实，即不承认伪“满洲国”，不使日本侵占东北的行为合法化。为此南京政府多次声明，它决不承认任何由日本政府所扶持的中国地方政权，一切未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政权将都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但是日本政府根本不理睬中国政府的声明，于1932年3月1日悍然宣布成立了伪满洲国。南京政府立即发表了声明，宣布中国不承认伪满洲国，并且要求国联及其附属机构，国联会员国都不承认它。中国代表颜惠庆等在国联大会上数次提出此案。几经周折，最后国联通过了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日本政府立即宣布退出国联，与国联断绝一切关系。这样，蒋介石企图利用国联牵制日本，制裁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再次失败了。

国联在英法的纵容之下，一直到欧洲大战爆发，始终没有通过任何一项制裁日本侵华的决议。日本帝国主义则利用了蒋介石国民党对其不抵抗政策和依靠国联之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三、华北事变

日本进一步对中国华北的侵占，采取了同侵占东北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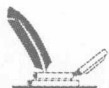


策略。对中国东北，主要是军事的武装占领；对华北，则是以外交、签约与经济侵略等手段为主，而把军事力量的威胁和侵略作为后盾。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认为日本的“国际关系非常地恶化了”，“今后也包藏着许多难关”，“短期内，国际关系的前途还未可乐观”。因此，内阁会议决定，对中国华北与东北的做法“分开”，“坚持和平状态”，“避免对各国作出突然袭击的行动”，“推动地方政权的独立倾向”，加紧在华北经济扩张“以发挥其（对日本）贸易及工业品市场的作用为主”等等。⁽⁸⁾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开始以新的方式对中国华北实行全面侵略。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进攻”，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详细情况后有论述）。日本在华北大力策划“自治运动”。9月24日，日本新任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天津发表声明，公开提出要“指导华北五省的自治”，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 “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镇压抗日运动；2. “华北经济圈独立”，使之成为日本的经济势力范围；3. “防止赤化”，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并认为这样就能“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接着，10月24日，日军策动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诡称这是“民意”的表现。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11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结军队，华北驻屯军也进行调动，并公开威胁说，“任何中国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辖区包括22个县。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蒋介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恶化的危险。24日,日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雨宫巽向中国政府代表陈仪提出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26日,中国政府尊命照办。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没再挂“自治”的招牌,仍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已把冀察置于南京政府之外,是变相的“自治”,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的要求。至此,华北已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

日本还策划了“内蒙古自治运动”。1935年8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派田中隆吉少将赴内蒙策动锡林郭勒盟盟长德木楚克栋鲁普(德王)加哟分离活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德王在日军操纵下,在察绥的边境上的化德加卜寺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下设外交、军政等八个公署。⁽⁹⁾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实行了空前的掠夺。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外交演说提出所谓“对华经济提携”口号之后,日本外务省拟定“对华经济提携原则”,规定“实行对华经济、技术、商务及金融的援助,确立全面的东亚经济集团”。“由日本提供工业品,由中国供给原料品……”,“整理旧债”等原则。⁽¹⁰⁾这就是说要在中国建立日、满、华经济集团。后因英、美反对未能全部实现。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由华北日本驻军司令部直接主持,积极进行,直接与冀察政务委员会交涉。日本制定了掠夺计划——即所谓开发华北经济八大项目。1. 修筑津石路(从天津到石家庄);2. 开发龙烟铁矿;3. 塘沽建港;4. 发展河北电器副业,成立华北中日电器公司;5. 华北中日通



航，建立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航空网；6. 改良华北种棉；7. 振兴华北水利；8. “整理河北井陘及正丰公司煤矿”等。1934年5月，日本对华铁路借款已达8952万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个主要由它投资的华北铁路兴筑计划，准备建筑十条铁路。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芦盐运日合同，在长芦大事收买盐田，为日军事工业提供了资源。日本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疯狂地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整个华北的金融命脉，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鲁晋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植棉田，天津的中国纱厂为日本在华纱厂所吞并，天津的电气业完全由日资包办，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四路已成为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飞机布满了华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秦皇岛成了日本的港口，华北其他的金融、矿业也为日本所独占。

日本的武装走私活动也猖獗。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在华北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我国国内商品输入总价值30%多。中国关税的损失，即达25506946元之多。仅1936年4月这一个月中便损失关税达800万元。⁽¹¹⁾日本的武装走私蔓延全国各地，走私海口除塘沽以外，福建有厦门，广东有汕头，陆路有长城各口。而南京政府财政收入减少1/3。日本武装走私也直接打击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输入也直接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与此同时，日本也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施加了外交压力，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公开发表了对华方针的“三原则”：⁽¹²⁾1. 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实现“中日亲善提携”；2. 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的“经济合作”；3. 中日“共同防共”。11月下旬，蒋介石同日本大使有